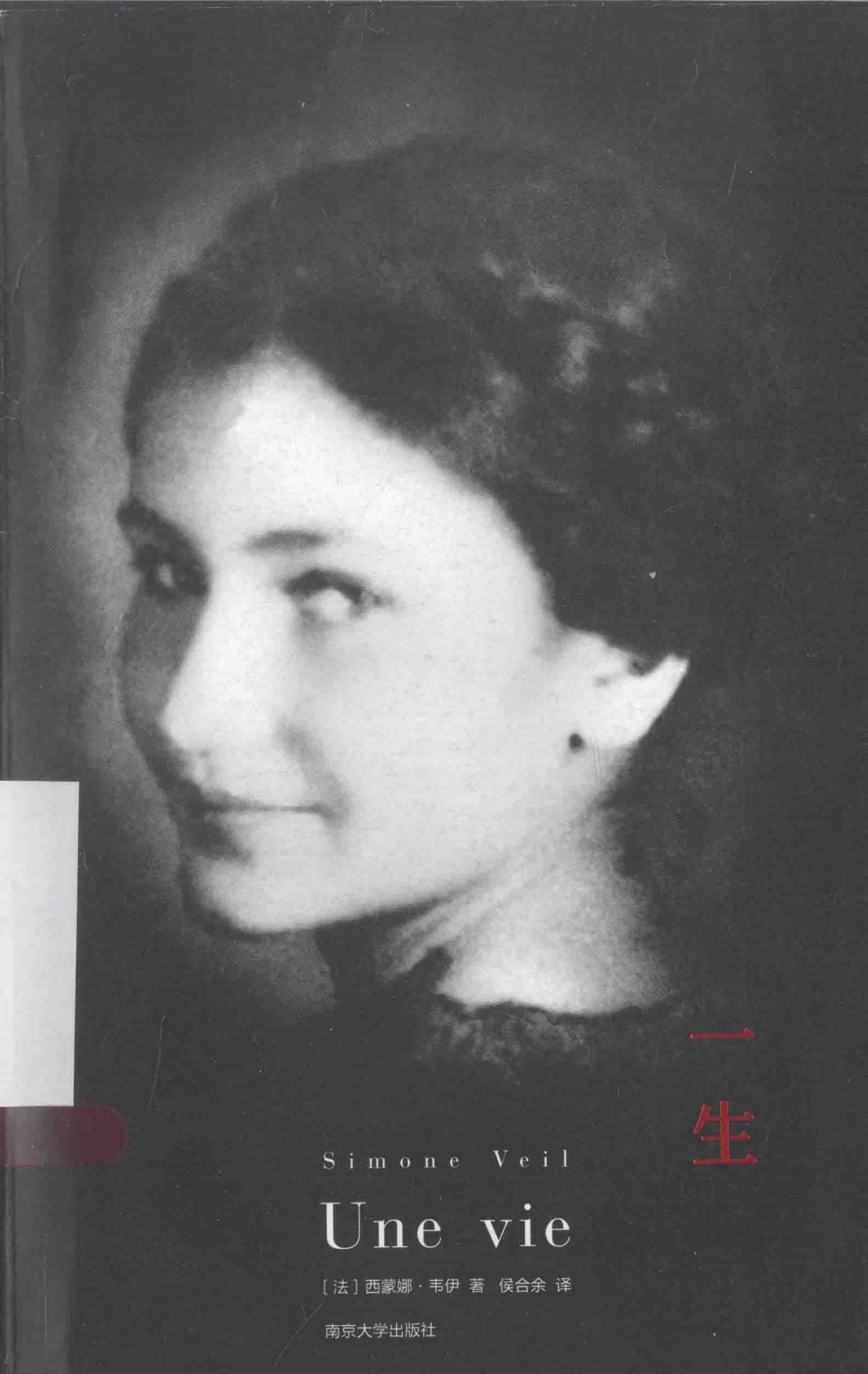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生

Simone Weil

Une vie

〔法〕西蒙娜·韦伊 著 侯合余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U n e v i e

Simone Veil

[法] 西蒙娜·韦伊 著 侯合余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/(法)韦伊著;侯合余译. —南京:南京
大学出版社, 2015. 6

(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传记)

ISBN 978-7-305-14933-7

I. ①一… II. ①韦… ②侯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
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5330号

Simone VEIL

UNE VIE

© Editions Stock, 2007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NJUP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10-2008-344号
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

出 版 人 金鑫荣

丛 书 名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传记

书 名 一生

著 者 [法]西蒙娜·韦伊

译 者 侯合余

责任编辑 芮逸敏 张 琦

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84千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14933-7

定 价 30.00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号: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: (025)83594756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谨以此书献给死于贝尔根-贝尔森集中营的母亲伊冯娜，
献给在立陶宛被害的父亲和让，
献给过早离开我们的米卢和尼古拉，
献给我的家人，感谢他们给我带来幸福。

莫泊桑，我喜爱的莫泊桑，应该不会怨我借用他的一部小说——他最美丽的小说之一——的名字，来描写一段完全真实的人生历程。

——西蒙娜·韦伊

目 录

第 一 章	在尼斯度过的童年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罗网 ·····	14
第 三 章	地狱 ·····	31
第 四 章	新生 ·····	56
第 五 章	法官生涯 ·····	72
第 六 章	政府工作 ·····	93
第 七 章	欧洲公民·····	116
第 八 章	重返政府·····	149
第 九 章	看见天狼星·····	164
第 十 章	运动·····	172
第十一章	正义者的光辉·····	177
附 录	·····	189

第一章

在尼斯度过的童年

保存下来的童年时代的照片证明，我们曾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看我们，兄妹四人围绕在母亲身边，多么温馨！再看其他照片：我们在尼斯的海滩上玩耍，在拉西约塔^①度假屋的花园里拍照，在女童子军^②营地，姐姐们和我开怀大笑……我们猜想名叫和谐与融洽的仙女们曾眷顾过我们的幼年，所以，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武器来迎战生活。父母给了我们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品性，使我们面临一些困难，除此之外，他们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团结、温暖的家庭，以及在他们眼里重于一切的东西——明智而严格的教育。

但是，命运很快就千方百计地搅乱了看似勾勒得那么美好的人生道路，以致让这一份生活的喜悦荡然无存。在我们家，就像在众多法国犹太家庭一样，死亡迅速而沉重地袭来。写到此处，我不禁伤心地想到，父亲和母亲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，不会知道他们的孙辈出生，也不会知道家庭添丁的甜蜜。他们无法估量我们曾经的生活给我们遗留下多大价值；而

①（普罗旺斯地区）罗纳河口省的镇，在马赛以东约 30 公里处。（如非特殊说明，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）

② 国际性的、按照特定方法进行的青少年社会性运动，目的是向青少年提供生理、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持，培养出健全的公民。

这份遗产，却是那么稀有而独特。

20 世纪 20 年代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。他们于 1922 年结婚，我父亲安德烈·雅各布那时三十二岁，母亲伊冯娜·斯坦梅茨，比他小十一岁。那个时代，这对年轻夫妇引人注目。安德烈朴实优雅，审慎持重，他珍视这种品格，就像看重他建筑师职业的创造性一样，可他获得罗马大奖后不久，被囚禁了四年，职业遭受重创。伊冯娜光彩照人，令很多人想起那个时代的明星葛丽泰·嘉宝^①。一年之后她生了第一个女儿马德莱娜，小名“米卢”。又过了一年，丹尼斯出生，接下来是出生于 1925 年的让和出生于 1927 年的我。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，雅各布家由两口子人增加到六口人。我父亲很满足。他认为，法国需要子女众多的大家庭。至于母亲，她是幸福的，孩子们充实了她的生活。

我父母亲都生在巴黎，确切地说是特吕代纳大街，两家只有两步之遥。第九区这个安静的角落里，在 20 世纪初时，住着很多犹太家庭，后来该是迁到其他区去了。父母亲虽然是远房表兄妹，却并不相识。家谱图证明我父亲这边在法国定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上半叶。我的祖辈那时住在洛林，靠近梅斯的一个村庄里。几年前我曾带着一家人去那里寻根。村里的最后一位犹太人，是个百岁老顽童，负责守护坟墓。他给我们指出了祖先的坟墓，其中一座立于 18 世纪 50 年代。面对我们先人遗留在村子里的踪迹，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么激动。

早在 1870 年战争之前，我的父系先祖就到了巴黎，作为手艺人住了下来。他们制作银质小盒子，销售范围逐渐扩大，直至中欧，大有成功之势。但后来，由于生意衰败，家庭生活困苦。

① 葛丽泰·嘉宝(Greta Garbo, 1905—1990)，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，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明星之一，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。

我祖父只是个巴黎煤气公司的会计,但他知道要为孩子们保证扎实的学业:我父亲在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上学,在投身建筑业之前曾获得罗马大奖的第二名;至于他的弟弟,曾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工程师。

正如所有被同化的犹太家庭一样,我父亲的家庭也非常爱国,并且不信仰宗教。他的祖先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,因为法国自1791年就给了犹太人全部的公民权。即使在德雷福斯事件^①发生时,震惊全国的反犹太主义浪潮都几乎没能动摇犹太人的公民地位。当共和国宣布德雷福斯上尉无罪时,一切又很快恢复了秩序。“1789年之后的人不会弄错,”那时,我祖父一边肯定地说,一边打开一瓶香槟酒,庆祝这一事件。1914年突然宣战时也是如此,即便我父亲当时刚服完兵役,并一心想着投入职业生活,可他像所有同龄的法国人一样,去了前线。他在莫伯日执行空中侦察敌人防线的任务,1914年10月被俘,之后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囚禁,几次尝试越狱之后,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。

那些年对他影响至深。童年时代,我们在他身上,在他对我们的悉心教育中,找不到他年轻时的朋友们所说的奇思妙想。至于德国,在他眼里始终是“世仇”。他不相信阿里斯蒂德·白里安^②所鼓吹的和解。

关于我母亲的家族,我了解得少一些。他们祖籍在莱茵地区(外祖母来自比利时),19世纪末在法国定居。和我父亲那边

① 1894年,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因被诬陷犯有叛国罪,被革职并处以终身流放,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太浪潮。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,但是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承认错误,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。

② 阿里斯蒂德·白里安(Aristide Briand, 1862—1932),法国政治家,外交家,法国社会党创始人,十一次出任总理,以主张对德和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

一样,我母亲这边也都是完全不信教的共和派人士。父亲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通融可言。我记得八九岁时的一件事:一个意大利籍表姐来家里住些日子,她第一次带我去了犹太教堂。爸爸知道后警告表姐说,再出现这样的事,就别想再踏进我们家的门。

很简单,我们是不信教的犹太人,并且也不隐瞒。在幼儿园,一个四五岁的女同学把我惹哭了,她说我妈妈肯定会“烧死”在地狱,因为我们是犹太人。然而,我对宗教一无所知。1937年,在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时,我们到一家餐馆吃午饭,高兴地点了腌酸菜。当表兄弟们——我们暂住在他们家——得知后,叫了起来:“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!吃酸菜!还在赎罪日这一天吃!”^①这个插曲是我学习犹太习俗的开始,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学得并不多。

然而,归属于犹太团体从未给我带来麻烦。我父亲强烈要求归属犹太团体,倒不是因为宗教原因,而是文化原因。在他看来,如果犹太民族始终是上帝的选民,那是因为这个民族是《圣经》中的民族,是有思想有文化的民族。我记得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问过他:“要是我不嫁给犹太人,你会反感吗?”他回答说,他绝不会娶非犹太女人,除非她是……贵族!面对我的惊讶,他解释说:“几个世纪以来,唯有犹太人和贵族识字,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这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它不仅印证了我们大家都

① 赎罪日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圣日,在新年过后的第十天。对于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,这是禁食日,在这一天完全不吃、不喝、不工作,并到犹太会堂祈祷。

罗^①的童话或是拉封丹的寓言。后来,到我们十四五岁的时候,他不能再忍受我们只对像罗莎蒙德·勒曼^②写的那样的“小故事”感兴趣了。他不仅让我们读古典主义作品,如米歇尔·德·蒙田、让·拉辛,或布莱兹·帕斯卡尔的,也让我们读现代主义作品,比如爱弥尔·左拉,或阿纳托尔·法朗士的,更让我吃惊的是,他甚至让我们读亨利·德·蒙泰朗^③的作品。他自己也读很多书。此外,他还很有绘画天赋,就像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,他在绘画上勤奋认真。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画的几幅漂亮的水彩画。可是,和我母亲不同,他不喜欢音乐。

关于不信教的问题,再说几句。不信仰宗教曾经是、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的准则。母亲是无神论者,我也是。在我眼中,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可是,我却不否认宗教给信仰者带来的帮助。我怀着钦佩的心情想起集中营里的那些年轻的波兰女孩,尽管集中营的生活让她们骨瘦如柴,可她们还是坚持在赎罪日那天不进食。在她们看来,尊重宗教仪式比活下去更重要。这让我至今印象深刻。

我已提到我们去参观世博会,这是件大事,因为当时我们不住在巴黎。我的父母亲在婚后两年,也就是1924年,离开首都去了尼斯定居。我父亲根据直觉,选择了蓝色海岸,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,但是可惜呀,这个直觉对他的事业发展来

① 夏尔·佩罗(Charles Perrault, 1628—1703),法国文学家,以童话集《鹅妈妈的故事》闻名于世。

② 罗莎蒙德·勒曼(Rosamond Lehmann, 1901—1990),英国小说家。

③ 亨利·德·蒙泰朗(Henry de Montherlant, 1895—1972),法国作家,作品兼有法国古典作家的淳朴和浪漫派作家的激昂,为评论家所称道。他曾经在作品中几次赞扬自杀,认为那是“在必要时的一点点自由”。

说却提早了几十年。他曾预料到,在那时正时髦的里维埃拉^①的海滨,建筑将会有巨大发展,特别是尼斯这个城市,正历经巨变,其部分原因是大量外国人的涌入。我父亲坚信财富在那里等着他,所以决定南下。这次迁居母亲并不高兴。应丈夫的要求,她放弃了令她痴迷的化学学习,转而照顾家里和孩子。现在她又要离开巴黎,离开她的朋友、家人,还有她喜欢的音乐会。但是,她并没有不乐意,她具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,习惯了经受得失,可是父亲认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。然而,无需怀疑,她把渴望独立的思想传给了我。我和她观点一致,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有可能做到独立,就要学习和工作,即使丈夫不赞成,因为丈夫是从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出发思考问题的。

刚开始的几年,爸爸的事业就跟他预想的一样,有了非常大的发展。他雇了两名绘图员和一名秘书,在拉西约塔设计了一栋别墅。在他看来,这只是这片土地(原来属于卢米埃兄弟^②,刚被一家海滨浴场收购)上一长列别墅群中的第一栋。在尼斯,我们住在音乐家街区一所漂亮舒适的房子里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和姐姐住一个大房间,可是哥哥让有他自己的卧室。我尤其记得父亲的工作室,他和合作人那里勤奋认真地工作,这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然而好景不长。如果说 20 世纪 20 年代生活很轻松,那么 30 年代则很艰难。和很多法国家庭一样,我的家庭也遭到经济危机——著名的 1929 年经济危机——的沉重打击。父亲的订单急剧减少,与客户面谈的时候他不够灵活,总是用自己在建筑学上的见解去说服客户,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。

① 里维埃拉(Riviera),地中海沿岸区域,包括意大利的波嫩泰、勒万特和法国的蓝色海岸地区。

② 卢米埃兄弟(les frères Lumière),法国电影和电影放映机的发明人。

1931年抑或是1932年，我们不得不卖掉汽车，从市中心搬到一个条件简陋、远不及以前舒适的公寓。公寓没有取暖设备，只在门口有个大火炉，也没有木地板，只有简单的普罗旺斯方砖。我的哥哥没有房间，只能睡在餐厅里。从那以后，我们都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我们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。即使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感觉不如其他人强烈，但我也看得出妈妈很为原来的房子感到惋惜。

五岁的年纪，这些小小的物质上的困扰对我没有什么影响。相反，我很喜欢这栋坐落在克吕维耶大街的房子，环境优美，临近乡村。房子的窗户朝向一座俄国教堂，该教堂是值沙皇访问法国之时，完全按照莫斯科的教堂仿建的。在躲避十月革命的难民到来之前，整个街区就受到了俄国文化的影响。在我家附近有几个网球场，也是沙皇来的时候建的。再远一点，有一条街，名叫沙皇太子大街。

我回想起我们的卧室，贴着带有图案的蓝色壁纸，卧室有一个阳台，阳台上养了许多盆栽。阳台外是一个园艺家种的大花园。乡村离我们很近，几栋楼房过去就是了，那边有一个小金合欢树林，长满了堇菜。星期天我们常去那里散步。长大一些后，会在星期四和童子军一起去。现在，这个街区已经认不出了，我曾回去过一两次。曾经的绿地都建起了房子，融入了城市。我勉强找到了哥哥读书的男子中学，这个中学曾经坐落在一个大公园的中央，今天却被成群的楼房包围了。那时候，这个有海、有阳光、有乡村的环境是我童年的天堂。

两个姐姐和我组成了一个紧密的三人团。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卧室里做作业的情形。即使父亲不要求我们在学校里出类拔萃，在家里，我们也有许多作业要做。当然，我们一级一级地升学，没有障碍，但是学业不是我们的强项。感兴趣的科目我们

会获奖,其他的科目我们只满足于按部就班。但是老师都很优秀,他们都有教师职衔。我不是个好学生,却常常是老师们的宠儿。一些同学都说:“你,老师什么都原谅你;可我们呢?就算错误比你小得多,也不会被放过。”这不全是假的。我想起了一些曾经保护过我的老师。其中有一对没有孩子的年轻教师夫妇在我初一或者初二的时候,放学后常常带我去吃东西,我曾对此感到骄傲。除此之外,正如妈妈的朋友经常对她说的,和哥哥姐姐们比,妈妈更疼爱我。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长久以来,我感觉自己得到了过分的保护。她们甚至还对我的母亲说:“伊冯娜,你太溺爱西蒙娜,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她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全家人,她会被宠坏的。”等我再大一点,我会自主地查字典来解决单词意义的分歧。

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,爸爸盯得很紧。吃饭的时候,他总是让我坐在他的右边,好监督我。他认为我总是一意孤行,举止粗俗,必须加强对我的教育,而且只有他才能纠正母亲对我的溺爱。很快,他就不喜欢我的反抗精神了。令我惊讶的是,他并不了解母亲独特的性格,我不得不说,他的许多决定和禁令都让我觉得是对母亲的刁难。

可是,我并没觉得自己行为特别。我最喜欢和妈妈待在家里,我曾觉得和她一起生活是我最大的幸福。那时我会靠着她,握着她的手,依偎在她的膝盖上,不放开她。我应该是很愿意独享她的爱,但家里的兄弟姐妹还是很团结。我们接受米卢的权威,因为她非常理智,连母亲都很愿意把事情托付给她。晚上,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没来拥抱我,我就会睡不着觉。哥哥让亲切地照顾我;丹尼斯也一样关心我,尽管她已经很独立。

如此受宠甚至有些任性的童年生活影像,久久留在我的脑海中。以至于我们从集中营回来时,姐姐见到的一个朋友无意

中抛出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我希望集中营的生活至少能让西蒙娜变得成熟一点了！”当米卢带给我这话时，我感到很震惊。那些年是多么奇怪的年代，人们不是总能注意自己说话的影响。况且，这个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在集中营的经历。她是否想和很多人一样，因为事实不堪忍受就否认它？或许吧，尽管我可以很大度，但是这类话我忘不了。

每当我想起战前的幸福时光，总是十分怀念。安静的氛围，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互相信任，共同的欢笑，永远逝去的时光，这样一种幸福实在难以用言语来描述。这是童年飘逝的芳香，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那么可怕，所以每当忆及就更感痛苦。我们的娱乐活动非常简单，因为除了阅读，只有用特别的方式，爸爸才会允许我们听收音机中的音乐或者去看电影。对于在那个时代看到的稀少的几部电影，我没有任何记忆。我们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在家中度过，后来当我们长大一点，就跟所在的童子军团的人一起玩。事实上，我并没有觉得家庭生活和我在外面的生活——在高中或是在童子军团——有脱节。大家一起构成一个同样的环境，让人有一种安全感。我觉得一切都像在家里一样。父母经常去拜访我的老师，也在家里接待他们，有时还跟他们一起去滑雪。童子军团的人都是高中同学，家庭之间常有来往，相互帮忙，比如妈妈帮童子军做领带。所以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外表并不正式的团体中，但是内部交流多样而且热情。到今天还有一些时刻让人无法忘怀。我还记得一个愉快的圣诞节，父母让姐姐们与朋友一起去山里滑雪，只有我们三个人留在家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妈妈只是我一个人的了。

夏天，我们全家一起去拉西约塔度假，住在父亲建的房子里。活动安排是去海边，在花园里玩耍，和堂兄弟们一起出去

玩。在尼斯，自四年级起，就有一个好朋友与我为伴。她很不幸，与父母相处得不好，他们是波兰籍的犹太人，在1935年公民投票决定德国收回萨尔^①之后来到法国。我们关系很亲密，妈妈也很欢迎她。和另外两个童子军一起，我们组成了不可分割的四人组。癌症过早地夺去了这三个朋友的生命，她们的离去至今还让我难过。

其中一个姓雷纳克的女孩和她的姐姐，在战争刚开始时来到蓝色海岸。她们的父亲朱利安是国会议员，在贝当^②政府出台反犹太法之初就被逐出国会。她们住在波利耶的凯里罗斯别墅里。这幢特别的别墅是她们的祖父——研究希腊的学者——泰奥多尔·雷纳克在世纪初建造的，他想要仿建古希腊的一个庞大豪华的宏伟建筑。这栋“希腊别墅”让我们着迷。它奢华得令人难以置信，甚至连吃饭的盘子都是仿照古希腊的餐具制作的。

那个年代，政治悄悄进入了我的高中生活。1936年人民战线在选举中获胜时，我在读七年级。高年级的学生积极参与，她们佩戴政治徽章，热烈讨论并评论时事、游行和罢工。其中有个女孩子在房间张贴了红十字领袖拉罗克上校的画像。后来，这

① 萨尔(Sarre)是国际联盟委托下，1920—1935年间被法国和英国占领及管制的德国地区。

② 亨利·菲利浦·贝当(Henri Philippe Pétain, 1856—1951)，法国元帅，维希法国首脑，一生颇为坎坷，民族英雄和叛徒集于一身。1878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领导1916年凡尔登保卫战出名，成为当时的英雄。在法军索姆河惨败后，他在最黑暗的时候重振了法军的士气。“二战”法国战败后，出任维希政府总理，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，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傀儡。1945年4月被捕，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，后改判终身监禁。

个女孩参加游击队的抵抗运动，几年后，被流放到拉文斯布吕克^①。

这种骚动于我而言是完全新鲜的。一方面，我们家里不谈政治；另一方面，我父母亲政见不同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爸爸买右派的日报《尖兵》，妈妈则瞒着爸爸读有社会主义倾向的《小尼斯人》，还有左派或者中间偏左的杂志，例如《启蒙》《杰作》《玛莉亚娜》。妈妈的姐姐和姐夫都在巴黎行医，他们从不掩饰左派观点，赞同共产主义。但是1934年到苏联的旅行改变了他们的观点。像安德烈·纪德^②一样，他们回来后感到沮丧，但是他们也并未因此而转向右派。

我清楚记得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反犹太主义上升的最初几年。法国人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记得那次殃及无数家庭的大屠杀。当时战争无处不在，而且摆脱不掉德国人。父亲一提到“德国鬼子”——他从来不说德国人——就生气，他痛恨他们。例如，当妈妈说：“如果听了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的建议，两个国家可能就和解了，也不会有希特勒。”爸爸反驳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和德国鬼子友好相处。”

几个月，甚至几年里，没有几个人明白莱茵河对岸到底发生了什么。1934年夏天，我们在拉西约塔度假时，妈妈和一个在德国住了几年后回来的年轻人打网球，这个人就是雷蒙·阿隆^③。他和妈妈讲了在柏林的见闻，街头暴力、大学生组织的焚书，总之一句话，就是纳粹主义上升。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。

① 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建于1938至1939年间，位于柏林以北五十英里。“二战”期间，共关押过十三多万名妇女、儿童和青年。在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这里之前，有近五万人被迫害致死。

② 安德烈·纪德（André Gide，1869—1951），法国作家，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③ 雷蒙·阿隆（Raymond Aion，1905—1983），法国重要思想家。